

《棉被》中人物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and Ethical Selection of Characters in Katai Tayama's Novel *Futon*

杨 建 (Yang Jian)

内容摘要：日本“私小说”代表作家田山花袋在《棉被》中书写了主人公爱而不可得的伦理苦闷和欲罢不能的伦理困境，这种伦理苦闷和伦理困境源于小说特定的伦理环境，即明治末期日本社会表层性苦闷之下的情感乃至信仰危机，人们在伦理问题上疑惑不定，也源于个体欲望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之间的剧烈冲突。时雄饱受煎熬，其越界伦理选择已触及人类道德底线。但时雄的伦理意识最终回归，理性意志战胜非理性意志，他走出伦理身份混乱，尽了一个成年男人、一个有妇之夫、一名长辈、一位师尊对 19 岁年轻未嫁女孩应有的保护责任。

关键词：田山花袋；《棉被》；伦理困境；伦理冲突；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杨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 20 世纪西方文学、东方文学、东方美学。

Title: Ethical Predicament and Ethical Selection of Characters in Katai Tayama's Novel *Futon*

Abstract: Katai Tayama,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Japanese I-Novel, described the protagonist's ethical anguish of love but not being able to get and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of trying to stop but cannot in *Futon*. Such ethical anguish in love affairs and ethical predicament were caused by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With violent conflicts between individual desire and social ethics, the common Japanese were under the crisis of emotion and belief covered by the superficial social depression and felt confused on ethical issues during that period. Tokio was suffering, and his transgressive ethical selection had touched the moral bottom line of human being. But finally, his ethical consciousness returned, his rational will triumphed over the irrational will, he was liberated from the ethical identity confusion, fulfilling the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y that an adult man, a married husband, an elder and a teacher should have for a 19-year-old young unmarried girl.

Keywords: Tayama Katai; *Futon*; ethical predicament; ethical conflict; ethical selection

Author: Yang Jia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Research Fellow of International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search Center and Hubei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79, China). Her research areas are 20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ture, Eastern literature and Eastern aesthetics (Email: yangjian64@163.com).

“私小说”（I-Novel）是日本大正年间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小说样式，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有人认为，“‘私小说’理论家们指出了作家的主体性，作家坦露自我的真诚，描写身边琐事的可行性，小说对社会的超越性”（王向远，“中国现代文艺理论”70）。该总结遗漏了“私小说”理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私小说”既具有对社会的超越性，又具有伦理维度。岛村抱月曾在“代序：论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一文中指出，现在是疑惑不定的忏悔的时代，作家应该凝视自己，暴露并忏悔自己的丑恶。日本私小说作家“一味在自我的心灵内部‘反刍着罪的意识’（伊藤整语），（……）私小说的这种文体要求把自我的行为和心境真实坦率地加以暴露（日本人称为‘告白’），它本身就具有忏悔或忏悔录的某些特定”（王向远，“文体与自我”5）。这也说明“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伦理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3）。

许多学者认为日本“私小说”代表作家田山花袋的《棉被》（1907）是“私小说”的开山之作，但中国学界对它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只有几篇文章粗浅地谈到了《棉被》与自然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棉被》与日本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棉被》的“私小说”文体特征与写作技巧等。鉴于此，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从人物的伦理苦闷、伦理困境、伦理冲突、伦理选择等方面重新解读这部作品，从而揭示《棉被》强烈的伦理意味，并说明“私小说”作家并没有脱离社会，其笔下的人物具有浓重的伦理情怀，只不过这种情怀被作家以感伤的情调予以一种深沉而又凝重的伦理叙事之中。

一、爱而不可得的伦理苦闷和欲罢不能的伦理两难

《棉被》描写了有妇之夫、中年作家竹中时雄与年轻美貌的女弟子芳子之间的微妙关系。时雄厌倦单调平庸的生活，也厌倦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充满青春活力的上门女弟子芳子的到来，唤起了他的感情和欲望，他想占有她，但碍于老师身份和道德，丧失了几次难得机会。不久，芳子与一位大学生田中恋爱，时雄十分痛心，他以师长姿态，串通芳子守旧的父亲，硬是拆散了

他们。当芳子离京回家后，时雄对她的思恋、怀念之情日甚一日。有一天，他来到芳子住过的房间，抱着芳子盖过的棉被，尽情地嗅着那令人依恋的女人味，性欲、悲哀、绝望猛地向他袭来。他铺上那床褥子，把被盖在身上，用既凉又脏的天鹅绒被口捂着脸，哭了起来。室内昏暗，屋外狂风大作。

小说是日本国民必读经典作品。小说伦理主线即一个已婚中年男人的情感危机和他对年轻女性的无望的情欲，以及受世俗伦理约束的烦恼、苦闷和悲哀。故事取材于作家亲身经历，主人公竹中时雄与横山芳子的生活原型即是现实生活中田山花袋与他美貌女弟子永代美知子。小说极力避免虚构而写真实，赤裸裸地告白了自己的隐私，苦闷、感伤、悲哀、绝望构成作品叙事基调。

时雄的苦闷首先源于事业不成功。在他的“郁郁不得志的文学阅历中，所有的创作支离破碎且至今未遇牛刀初试的机会。他沉浸在无尽的烦闷之中，青年杂志每月的恶评更是令之痛苦不堪。在其自我意识中，自然保留着有朝一日成名成家的愿望，但心底里却充满了苦闷”（2）¹。他的苦闷也来自于中年已婚男人的家庭情感危机和生活单调乏味、令人倦怠，干什么都没劲儿。“他感觉，自己寂寞得近无容身之地了”（4）。他曾经幻想着如何背着妻子去偷情，以此驱散寂寞。“如果可能，不如重新体验新的恋爱”（4）。“他甚至产生过更加过分的幻想，他想象妻子妊娠之中突然难产而死”（4）。他就可以续弦其他年轻美丽的女人了。但其苦闷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无法确定自己对芳子的感情性质。“难道那样的感情仅仅是一种性欲，而不是所谓的爱情？”（1）如果仅仅是一种性欲——遭遇中年危机、厌倦家庭生活的有妇之夫对年轻美貌女性的强烈性欲，只是一种生理需要，无关感情，当然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但如果是爱情，那就另当别论了，无论是师生恋，还是普通的男女恋情，在受到现代文明熏陶、要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中，其合理性不容置疑。时雄也无法把握芳子那种亲切的态度中是否包藏了爱情。“年轻女人的心理却是捉摸不透的。也许，那种温暖而令人欢喜的爱情只是女性特有的自然的表露？美丽的眼神和温柔的态度统统都是无意识或无意义的？就像自然的花朵令人感觉慰藉一般”（1）。

从情节发展来看，时雄和芳子的确或隐或显存在着师生恋，只是一直停留在精神恋阶段，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小说一开始就通过时雄的心理活动透露了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

那些表达感情的通信，证明了两入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正因家有妻小，顾忌社会舆论又是师生关系，两人才没有最终堕入爱情的陷阱。然而相互交谈时的内心激动和相见之时的热切目光，又的确在二入心中

1 本文有关《棉被》的引文均来自田山花袋：《棉被》，魏大海、邵程亮、周祥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潜置了狂烈的暴风骤雨。一旦遇见适当的机会，那般心灵风暴必将毁坏一切关系——包括夫妻、亲友、道德和师徒。至少他相信会如此。（1）

周围的人也敏感地觉察出这师徒二人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显然超出了师生之谊（11）。最敏感的人应该是时雄的夫人，她本来并未提出异议，甚至没有一点不满迹象，但现在也有些紧张和妒忌了，有时还会冷言冷语，特别是看到丈夫为芳子的事失魂落魄时。而妻子娘家的亲戚间，早已如临大敌地开始追究了。

从芳子的言行中，我们也能看到年轻女子有意无意间抛撒的青春、美丽、暧昧和受到压抑的性苦闷。芳子“华贵的嗓音，艳美的身姿，与时雄以往的寂寞生活形成了何等对照！”（8）时雄突然联想到哈普特曼的剧作《寂寞的人》（*The Lonely People*），从主人公约翰内斯·福凯拉特的心事和悲哀中找到了知音。

在时雄眼中，发妻可谓一无所有，只有旧式盘髻，泥鸭步式和温顺贞节。发妻最大的满足不外乎生儿育女，她不会跟随夫君，像美丽的新派娇妻那样相拥依偎着散步，也不会去探亲访友时流畅自如地与人交谈，甚至没有兴趣读自己耗尽心血写出的小说，与夫君的苦闷、烦闷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时雄不由地心中呼喊：“孤独哇！”他像《寂寞的人》约翰内斯一样，深切感受到发妻的毫无意义。（7）

他甚至感到自己连《寂寞的人》中的约翰内斯也不如。芳子的到来，照亮了中年男人时雄的生活。“那时髦、新派的美丽女弟子‘先生’‘先生’地叫着，时雄放佛变成了世上受人景仰的伟人，他无法不为之而心动”（8）。

小说有许多地方描写了芳子艳丽的装束、迷人的表情、崇拜的眼光、可爱的言谈。“年轻女孩儿的内心憧憬着色彩斑斓的恋情物语，富于表情的眼睛闪烁着深不可测的光辉”（3）。小说还特别提到她给时雄写的一封厚厚的哭诉衷肠的信，这封信引起时雄非分之想。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此事两个月之后的一个春夜二人在芳子住处见面的情形，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芳子浓妆艳抹，在和导师讲话时的表情令人难以抗拒：

就那么直勾勾地望着时雄的脸。真的是美艳绝伦！面对芳子勾魂消魂般的一瞥，时雄却没出息地心中怦怦跳。片言只语，两人谈的只是普通话题却又心照不宣，都知晓这平凡的故事其实包含着并不平凡的内容。此时，倘若再接着交谈十五分钟，谁知将会出现怎样的状况？芳子富于表情的眼睛闪烁着光辉，语言文雅，一副非同寻常的态度。

“今夜的芳子怎么这样漂亮？”

时雄有意若无其事地说。

“什么？哦，刚刚洗过澡。”

“这胭脂怎么也这么白？”

“您说什么呢？先生！”芳子笑得弯下了身体，一副娇媚的姿态。

(11-12)

时雄的苦闷还来自于他不知如何应对芳子已经出现的新恋情。当田中出现时，他方寸大乱，心中郁闷不已，仿佛真的被人夺去所爱。时雄虽然也感到“看来，我和她真的没希望了。自己真蠢。三十六岁了还有三个孩子，竟做那般非分之想。可是〔……〕可是〔……〕”（1）就是放不下。“‘总之错过了机会，她已名花有主！’他一边走一边歇斯底里地喊道。同时用手揪着自己的头发”（2）。

他无法安心工作。“可两三天来，头脑里乱麻一般，实在是写不下去。写了一行便停下来，思前想后，再写一行，又停下来。始终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头脑里浮现的，总是支离破碎的思绪，时时表现为一种猛烈、偏激或绝望”（3）。他没有勇气读书也没有勇气写作，在秋雨的阴凉中体验着寂寞的苦闷和苦涩的滋味，感到那种不争气的命运始终压迫着自己，这便想起屠格涅夫所谓的局外人或多余人！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屠格涅夫小说主人公虚幻无常的一生。

时雄陷入欲罢不能的伦理困境。他寂寥不堪，中午也说要喝酒，喝得红头赤脸，然后乱发脾气，甚至醉倒在厕所里。“混蛋！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妈的爱情还有师生之别，真受不了”（20）。他躺在大树根部的地面上，亢奋的精神状态，奔放的激情和悲哀的快感，某种力量发展到了极致。他为痛切的嫉妒所苦恼，又要在冷漠中将自己的状态客观化。“热烈的情思和冷僻客观的批判，像线绳一样牢固地纠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精神状态”（21）。

二、个体欲望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

明治时期，日本国内欧化主义和国粹主义相互角力，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逐步跻身现代国家之列，但各种东西方思想的冲突，各种新旧理念的纠葛，那所谓“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求不得”的人生痛苦定义，仍然在人们的心中激烈地碰撞。日本传统的伦理体系、特别是家庭伦理受到巨大冲击，一种绝对自由的、个人至上的近代伦理思想正在悄然滋生，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仍然非常强大，两股力量的张力造成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矛盾分裂的人格。《棉被》中主人公时雄爱而不可得的伦理苦闷和欲罢不能的伦理困境，其个体欲望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显露出明治末期日本社会表层性苦闷之下情感乃至信仰的危机，人们在伦理道

德问题上的疑惑不定。

时雄就是个新旧交替时期的人物，既新派，又守旧。他受到欧洲近代文明的影响，阅读了屠格涅夫、哈普特曼、莫泊桑等许多作家的作品，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和个性解放思想开始萌动，但封建思想也根深蒂固。比如他的女性观就充满矛盾，在明治时代的“新女性”和传统女性之间游弋不定：

他感觉如今的女学生与自己恋爱时代的女学生，气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事实上，从主义上或趣味上讲，时雄又十分喜爱、欣赏这样的女学生气质。在昔日的教育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女性，如何堪当明治时代的男儿之妻？时雄历来主张，女子当自立，女性亦应具有充分的意志力。他也在芳子面前时常鼓吹自己的主张。然而，真的面对如此新派、时髦的实行者时，他却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28）

时雄看到社会日渐进步，女学生已然成为社会一景。“如今已很难找见自己恋爱那个时代的窈窕淑女。（……）谈恋爱，说文学，讲政治，已全然没有过去的旧式姿影。他觉得所有这些，与自己都永久地那般遥远”（2）。但在当初是否接受芳子为徒的问题上，他却表现得非常守旧，这恐怕是他深藏在骨子里的东西。当他收到芳子那封洋溢着崇拜之情的手简后，便连篇累牍地写了回信，“手简里写到，女孩子涉足文学是卤莽的，女人生理上应尽人母之义务，而处女成为文学家更是一种危险。时雄不厌其烦地述说着，有时文辞近乎詈骂”（5）。时雄时常用这些话教导芳子：

“如今的女孩子必须实现自我的觉醒。不能像过去的女人那样充满依赖心。正如苏德曼小说中的玛格达所言，女人不可懦弱到仅仅由父亲手中移到丈夫手中。日本新女性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且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说到这里，他又例举了易卜生的娜拉和屠格涅夫的叶莲娜，说明俄国、德国的妇女具有丰富的意志和感情。时雄接着说道，“然而所谓的自觉中，理应包含自省的要素，因而不能过度地滥用意志和自我，必须意识到，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10）

时雄在这些教导里用到“新女性”“自我觉醒”“丰富的意志和感情”等新名词，这些都是当时日本社会里的新思想。这些教导对于芳子而言宛若圣旨，景仰之情愈加高涨。她甚至感觉先生的这番话，比基督教的教义更自由更权威。可是，“然而”后面所谈到的问题却令人困惑不解，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自觉”与“自省”的关系呢？所谓“过度地滥用意志和自我”又是依据什么尺度作出的评判呢？

及至芳子成为自己的学生之后，时雄开始有了多重伦理身份，他既是老师、

监护人、精神上的父亲、“温情保护者”（35），又是暗恋患者。小说多处描写时雄的暗恋之苦，也描写了其道德自省。这是一场理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搏斗，不过这种搏斗是同时发生在老师时雄和弟子芳子身上，只不过对芳子内心的冲突没有正面描写，更多聚焦在老师身上。这里理性是指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而兽性指的是人的非理性意志。他们挣扎于其中，使尽全身力气，难以自拔，最终还是理性占了上风。

我们先来看看时雄的自我审视和揣度：

他是一位作家。应当有能力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心理。（……）退而言之，即便女人真的爱上自己，两人仍是师徒关系呀。自己家有妻小，人家却是美丽鲜花，妙龄少女。两人无法处置这种相互间的情意缠绵。再说，姑娘激情荡漾的情书不也明里暗里表达了她的苦闷么？那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姑娘那是最后一次传递情意，却不愿最终地揭开谜底。女孩儿生来谨慎。怎好再三地表露情感呢？在这样的心理下，姑娘或许是十分失望的。随之，便有了眼下的变故。（1-2）

这个变故就是芳子有了自己的恋人——同志社大学的学生、神户教会的秀才田中，芳子旺盛的生命力和激情终于有了真正可以倾注的对象，这也是她的伦理选择，是对于师生之恋不伦行为的有意逃避。她与田中这份恋情纯洁年轻，而全然不同于和时雄在一起时的沉重和甜蜜。

时雄感觉懊恼。“总之错过了机会。她已名花有主！”（2）他一边走一边歇斯底里地喊道，同时用手揪着自己的头发。心情也是一日多变。他处于伦理两难选择状态，有时真想彻底地作出牺牲成全他俩，有时又想“大公无私”，彻底破坏弟子的恋情。

虽然在自己的优柔寡断中，两次机会都擦身而过，但他心底里仍旧暗藏着一个小小的愿望，他在期待着第三次机会或第四次机会，希望藉此创造出新的命运或新的生活。时雄烦闷不堪，心乱如麻，嫉妒、怜惜、悔恨，种种感觉汇聚一处，似旋风一般在他的头脑里回旋，其中也夹杂着作为老师道义感，焦虑的感觉似火焰燃烧。甚至为了自己心爱女人的幸福，时雄情愿牺牲自己。于是，晚餐的酒量明显增加，时常喝得烂醉如泥。（13）

三天以来，他一直在与自己的苦闷搏斗，心中有一种强烈的自制力——理性，阻止他在性的耽溺中堕落，有时，他又十分懊恼那股自制力对于自己的约束，因为他总是在无形中落败或被征服。在另一个场合，时雄也发出了同样绝望的声音，流出自己的窘况和内心的挣扎：

“幼雏怎会钟情于老鸟？自己已失去美丽的羽翼，无法再去吸引那只幼雏。”想到这里，一股无以言表的强烈寂寞向他心中袭来。（……）“那被孩子夺去妻子、又被妻子夺去孩子的丈夫，如何排遣自己的寂寞呢？”时雄定定地望着洋灯心中想。书桌上打开的图书是莫泊桑的长篇小说《超乎死亡的坚强》。（37）

他现在的状况和莫泊桑这部小说的基调可谓正好一致：“生活是既可怕，又温情，又无望。”¹他想起了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父亲》，回忆起当时阅读中的痛切感受，尤其是少女委身男人之后，痛苦哭泣的场面。“突然间，一种相反的、抗拒阴暗想象的力量强烈地争斗着。他辗转反侧，沉浸在无尽的烦闷与懊恼之中。时钟已经敲过了两点、三点”（54）。

三、身为人师的伦理选择

时雄身为人师，其几欲越界的伦理选择触及到人的道德底线。首先来看看当他收到芳子厚厚的信件时的反应：

时雄觉得，芳子当初来信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他也为此懊恼了一夜，不知该如何回复芳子。发妻在一旁睡得好死，时雄几次偷窥发妻的睡姿，心中产生了自责之情，只感觉自己的良心处于严重的麻痹之中。于是第二天写给芳子的回信，便摆出一副师道尊严的模样。（11）

时雄的懊恼来自于他的私心、怯懦、优柔寡断，也来自良心未泯——“良心处于严重的麻痹之中”，在“几次偷窥发妻的睡姿”之后，他终于从“不知如何回复芳子”——一种欲罢不能的状态过渡到“心中产生了自责之情”，回归师道尊严。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那天月夜他面对芳子挑逗时的情形，“时雄坐了片刻起身告辞。芳子一再挽留，别这样急着回去呀。可无论怎样劝，时雄都坚持要回去，两人只好依依不舍地送走了那个月夜。在芳子白皙的面庞中的确包含着深不可测的神秘感”（12）。虽然面对芳子的挑逗时雄觉得难以抗拒，但传统伦理道德的压力使他没敢欣然接受，居然跑掉了。

到了四月，春夏交替之际，芳子生病，变得体弱多病，面色苍白，陷入神经衰弱的痛苦之中。虽然大量服用了安眠药，却仍旧无法正常入眠。“无尽的欲望和生命力，毫不踌躇地诱拐着这个妙龄女孩儿”（12）。情欲萌动的女孩儿，如何才能平复下来呢？芳子四月返乡养病，九月再来东京时恋人田中出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最后，我们看到三天来的苦闷烦恼使时雄认清了自己的前途，与芳子的

1 莫泊桑在写作此书时写给洛尔的信中的话。

这段情缘已告一段落，今后的任务只有知难而退，竭尽为师之责，为自己心爱的姑娘谋取幸福。“真憋死人！”（15）他发出了苦闷的呐喊，但他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否则将会为社会所不齿。

为了劝说田中离开东京，离开芳子，时雄戴上了伪善的面具。从将来的角度，从男人牺牲精神的角度以及事情发展的角度，总之从各个方面规劝田中返乡。“他感觉自己非常愚蠢，仿佛自己做了蠢事而嘲笑自己。他还联想到，自己曾违心地说了那么多奉承话，为了遮掩自己心底的秘密，还说要为两人的爱情担当温情的保护者，也曾想找人介绍或帮忙谋求廉价的翻译工作。他在心里骂自己不争气，这种好人做不得”（35）。

时雄左思右想，想到了是否通知芳子的家人，把芳子领回去。“他无法忍受为了自己的非分嫉妒，或为了自己的变异恋情，而牺牲自己对于心爱女孩儿的热烈爱情；与此同时，他也无法忍受自己的道德家形象——所谓的‘温情保护者’。他同时也感到恐惧，害怕芳子的父母知道后，真的把她带回家乡”（35）。

时雄也不厌其烦地对芳子进行了切实、真挚的说教，他说到精神恋爱、肉体恋爱、恋爱与人生的关系、有文化的女性应坚守的妇道等。他还痛切地解说了古人对女性节操的训诫，与其说那是社会道德的制裁，毋宁说是为了保护女性的独立，一旦男人占有了女性的肉体，女性的自由便将彻底崩溃。他的说教冠冕堂皇，一番苦心，真挚而热情，和芳子分手前还专门叮嘱她“最好别让老师担心。能做到么？”（37）可是芳子出门后，时雄的脸突然变得异常险峻难看。他内心里的苦又有何人能知？他自己又何尝不想占有芳子的肉体？他对芳子的留恋是用任何道理也说服不了的。“芳子的美无以言表，这种美令时雄荒野般的心灵鲜花盛开，或令锈死的时钟再度鸣响。芳子的出现，似乎令周边的一切都在苏醒复活。然而，时雄不敢想象，自己又将再度回归到过去那种寂寞、荒凉的平凡生活中（……）他感觉到不平 and 嫉妒，滚烫的眼泪流在脸颊上”（43）。我们突然有点可怜起这个男人来了。“斯芬克斯因子从人同兽的结合点上说明人同兽之间只是一步之遥或一墙之隔”（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15），时雄就是这样挣扎于人性与兽性之间。最终，时雄的伦理意识回归，理性意志战胜了非理性意志，走出伦理身份混乱，在对待芳子的问题上，他没有突破人的道德底线，没有充当无耻的诱惑者，至少，他还有些良心，尽了一个成年男人、一个有妇之夫、一名长辈、一位师尊对19岁年轻未嫁女孩应有的保护责任。

时雄已经无法履行监督职责，只好劝说芳子将实情通报父母，他自己也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事情的缘由。“时雄自欺欺人充当了‘温情的保护者’——所谓悲壮的牺牲”（40）。在芳子决定和田中私奔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严肃的解决途径——给芳子父母写信，让他们把芳子接回去。这中间有嫉妒和私心，也有担心芳子被田中始乱终弃、失去女性贞操的意思。

回家以后的芳子总要嫁人的，这位神户式的新派时髦女也许最终又回到了传统老路上去，而时雄剩下来的日子又将如何度过呢？我们可想而知。和岛崎藤村的《破戒》一样，《棉被》也表现了“觉醒者的悲哀”。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开始觉醒，已经提到“理性”（reason）、“野性”（wild nature）、“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自由意志”（free will）等现代非理性主义新名词，在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也想在个性解放的道路上迈出自己的步子，但时代还没有提供必备条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说服自己，在强大现实压力面前，他们只好选择逃避。

Words Cited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外国文学研究》6（2015）：10-19。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Expos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5): 10-19.]

田山花袋：《棉被》，魏大海 邵程亮 周祥伦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Tayama, Katai. *Futon*, translated by Wei Dahai, Shao Chengliang and Zhou Xianglun. Shanghai: Fudan UP, 2013.]

王向远：“文体与自我——中日‘私小说’比较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新探”，《四川外语学院学报》4（1996）：1-6。

[Wang Xiangyuan. “Style and Self: A New Exploration of Two Basic Problem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I-Novel.” *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4 (1996): 1-6.]

——：“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日本文艺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998）：68-75。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nd Japanese Literary Theory.”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1998): 68-75.]